

典籍翻译研究

从话语镶嵌到传播突围

——《沧浪诗话》首个英语全译本的逻辑理路与翻译策略研究

钟厚涛

(国际关系学院 文化与传播系, 北京 100091)

摘要:1996年,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陈瑞山在美国将中国宋代经典诗话类著作《沧浪诗话》全文翻译成英语,这是目前英美学界第一也是唯一的《沧浪诗话》英语全译本,对后来的译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导向性效应。陈瑞山译文并非描述性翻译,也非实证性翻译,而是借助释义式路径和抵抗式策略,主动赋能,重新编码,凸显与扩散异质性,由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转换。从关系主义思维来看,陈瑞山译文在诸多微观场景中隐含着复杂的政治逻辑,试图在美国学术精英规训和学术秩序遵从的双重制约下,突围英语话语霸权,彰显中华文化底蕴的文化负载词汇,提炼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以调和性而非支配性话语有效嵌入西方文论体系,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杂合文本扩散,有效提升以散点透视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诗话类著作的国际传播效能。

关键词:《沧浪诗话》;全译本;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3-0143-12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3.012

0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强势登陆与广泛扩散,中国文学理论在近现代经历了巨大转型,导致中国古代文论逐渐无法对当下的文化现象产生全面的解释效力。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命题才能够接踵而来,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曹顺庆,2020:76)。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中国学者也在逆向而行,积极向西方译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彰显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禀赋,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化”到“化国际”、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积累了宝贵经验(姜锋,2021:7)。中国台湾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对台战略预置和重点问题研究”(3262024T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钟厚涛,男,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

引用格式:钟厚涛.从话语镶嵌到传播突围——《沧浪诗话》首个英语全译本的逻辑理路与翻译策略研究[J].外国语文,2026(3):143-154.



本刊微信公众号

地区学者陈瑞山关于《沧浪诗话》的全译本即为其中之一。

1996年,陈瑞山(Ruey-shan Sandy Chen)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以《沧浪诗话》的英语翻译作为主攻方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这是目前《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中唯一的全译本。作为大陆学界第一篇专门研究《沧浪诗话》首个英语全译本的论文,本文尝试将该译本的源语文本(source text)与译入语文本(target text)平行放置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文本细读与语境解析,深入考察陈瑞山是如何在“第三空间”生成“非此非彼”却又“亦此亦彼”的新质文本样态(李沐子,2023:117),以期更好地厘清源语文化、原作者、源语文本与译者、译本、译入语文化等多种因素之间互动反馈的文化机制,进而以此为个案,层次转移,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转换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现实困境与突围策略。

1 拉斯韦尔模式下的控制分析与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惯习

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Lasswell, 1949: 84)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中,构建了线性传播过程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由此也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经典维度,分别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谁”无疑指涉的是译者,因而背后需要重点考察译者受何因素控制、为何而翻译,因为翻译的目的往往会直接攸关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对翻译文本的处理方式,如翻译目的论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Christiane)所言:“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是任何翻译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原则。”(Nord, 2001:12)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Nord, 2001:29)。那么有必要深入追问的是:陈瑞山对《沧浪诗话》进行翻译注释的能动性(agency)何在?他对潜在目标受众(target audience)又是如何定位的?

在早期的翻译研究中,译者多处于“隐形”和“失声”的状态,但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译者越来越打破从属性地位,逐渐由幕后走向前台(王亚等,2023:124)。尤金·奈达(Nida, 1964:84)曾强调:“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焦点因素(focal element),他对于翻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来说,具有中心(central)作用。”从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角度来讲,也应跳脱和超越语言文字本身,而将翻译作为译者的一种行为放置到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中加以深入考察。

1.1 译者惯习的显现

译学是人学,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林克勤,2026:165)。这里有必要首先对作为译

者的陈瑞山进行一番考察,因为从选择《沧浪诗话》作为翻译对象,到选择《沧浪诗话》翻译所依据的汉语底本,到如何对《沧浪诗话》进行段落划分,再到具体的翻译过程,作为译者的陈瑞山都对《沧浪诗话》这一文本进行了“摆布”或“操控”(manipulation)。因而,对陈瑞山的了解,无疑对深入分析他的《沧浪诗话》英语全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顺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对陈瑞山的学术背景进行简要的介绍。在其博士论文的最后一页,陈瑞山给出了A4纸大小的简历(Vita)。据此可知,陈瑞山从本科开始,一直都在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接受教育,而且硕士和博士学位都在美国获得。陈瑞山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坚持诗歌创作,著有诗集多部,“对于诗歌和诗歌理论(theories of poetry)具有极大热情”(Chen, 1996: v.),因而他对诗歌的理解可能要比普通的学者来得更为通透一些,而对《沧浪诗话》这样的经典诗歌理论著作则更有可能产生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独到的理解。因而,对作为身兼学者和诗人这样双重身份的陈瑞山而言,主动去翻译《沧浪诗话》或许应该是其惯习(habitus)的拓展和顺延,可谓是“诗与诗的跨时空邂逅”。在翻译社会学中,所谓惯习主要是指译者在长期的社会轨迹中累积而成的感知世界和行动实践的认知图式和定势系统,是译者主观世界与外部场域相互调解的中介,具有常态化甚至无意识等特征。陈瑞山翻译《沧浪诗话》不是为了金钱和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利用自我对诗歌的素养和英语的学识,推动《沧浪诗话》在异域的跨文化再经典化重构(Bourdieu, 2005: 43)。简言之,译者的学术惯习对其翻译的议程设置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译者内在惯习的外在转换也对译文的生成样貌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1.2 翻译策动者的偏好

从受众心理学(audience psychology)与教育体系的官僚模式(bureaucracy)角度来讲,陈瑞山对《沧浪诗话》的英译与译者所受策动者(translation initiator)其博士指导教师息息相关。根据该论文封面给出的信息,当时陈瑞山博士论文指导小组成员有:吉纳特·福罗特(Jeannette L. Faurot)、张诵圣(Sung-sheng Y. Chang)、托马斯·维特布莱德(Thomas B. Whitbread)、沃伊切霍夫斯基(Dolora A. Wojciehowski)和颜娴(Sian L. Yen)五位教授。在这五位教授中,当然是陈瑞山导师吉纳特·福罗特对其影响最大。根据陈瑞山在《致谢》中所言,吉纳特·福罗特教授由于知晓他对佛教有所了解,而且对诗歌又非常喜欢,因而敦促他进行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中国诗学著作《沧浪诗话》的英译。而中国诗歌和中国诗学研究恰好又是吉纳特·福罗特的专长,这样他就可以更加充分地指导陈瑞山的博士论文。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推测,吉纳特·福罗特作为陈瑞山的指导教师,既是他的初始受众(primary audience),更是这次翻译过程中的权力话语规训者。与普通的翻译不同,陈瑞山进行《沧浪诗话》英语翻译和注释的主要目的是要完成博士论文和获得博士学位,背后必

然会遭遇教育场域(field)权力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双重约束。从关系主义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的角度来审视,陈瑞山与其导师之间表面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但在权力结构和制度化的底层逻辑中却是处于相对从属和屈从的位阶。在教育权力、文本翻译、意义生成和学术审查多维一体的互动过程中,其博士指导教师吉纳特·福罗特的认可与支持就变得至关重要,是陈瑞山《沧浪诗话》英译最为重要的“权力放行者”,也是翻译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撑力量”。

1.3 学术空白点的弥补

除上面所提到的议程设置和受众期许外,《沧浪诗话》的英译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当时学术语境的驱动。在陈瑞山翻译《沧浪诗话》前,尽管有英语世界的学者对《沧浪诗话》的局部章节进行过摘译,全译本却一直未曾出现。陈瑞山正是看到了这种学术空白点所造成的文化需求,当然也主要是看到了《沧浪诗话》的巨大学术价值,才试图将其全部翻译,以供英语世界的现代读者阅读,即如他自己所言:“南宋时期严羽所创作的《沧浪诗话》(*Canglang shihua, Canglang's Remarks on Poetry*),一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诗歌批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在英语世界中,却无人对这部著作进行全译;现在的英语期刊和选集中,只有《沧浪诗话》的一些片段。”(Chen, 1996: vii)

可以看出,在翻译《沧浪诗话》前,作为一种先期工作,陈瑞山已经认真考察过前人的相关成果。例如在1992年发表的《沧浪诗话的历史范例》一文中,作者就认同性地引用了《沧浪诗话》另一主要译者刘若愚的观点:“严氏的理论是相当有组织的。难怪有些理论家像明朝的胡应麟、近代的刘若愚都视严羽的《诗话》为宋代最佳的文学理论之作。刘若愚说:‘在严氏之前已有一些文评家偶尔会在诗中使用禅语,但严氏却是第一位坚持以禅论诗的人,也是第一位对后代文评家影响巨大的人。’”(陈瑞山,1992:68)考察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发现了前人翻译的缺陷——“以前的学者,曾对《沧浪诗话》第一章和第三章中的许多章节,进行过翻译。不过他们对于《沧浪诗话》中某些文字或短语的解释,要么缺失,要么不准确。”(Chen, 1996: 56)正是由于看到前人翻译的不足之处,陈瑞山才要自己翻译,对前人进行纠正和超越。例如,陈瑞山在对“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一句话翻译的注释中,就对宇文所安关于这一句话的翻译进行了批评(Chen, 1996: 66)。而在翻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时,则对叶维廉在《严羽与宋代诗学》中对这句话的翻译提出了批评,认为叶维廉的某些翻译完全是累赘冗余的(Chen, 1996: 94)。陈瑞山考察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前人翻译中同样也有很多的价值和长处,而在自己的翻译中,同样也可以对其参照借鉴,或者将不同译者的长处进行比较:“在很多情况下,我都会采用比较的眼光(comparative views)。以‘骨董’为例,它是指某些不同于现在的东西,我把它解

释为 trivial details, 张彭春则将之翻译为 disconnected fragmentariness, 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将之翻译为 arcane, 而德国学者德邦则将之翻译为 verschwommenheit, 意思是指 under water, fuzzy, or not clear。”(Chen, 1996: 56)

2 学术翻译的文化资本驱动与意向读者的双重定位

赫曼斯(Hermans, 2004:121-124)提出,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属于社会范畴,人们在相互沟通中形成翻译的认同、共识和期许,这就构成了翻译的社会系统。从布迪厄(P.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reflective sociology)、拉图尔(B.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及鲁曼(N.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有许多无形的社会性力量同时左右或操控着其翻译行为,这些操控力量包括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赞助商(patronage)、意向读者(intended reader)等,所有这些元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本生成形态。

考虑意向读者在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例如欧阳桢(Eoyang, 1993: 63-79)在其《透明之眼》中就曾专列一章即第四章用来讨论“中国文学翻译中的读者”,足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所要关注的就是,陈瑞山在不同语言的文化转码(transcoding)过程中,对“意向读者”是怎样定位的?这种读者定位又是怎样影响他的翻译过程的?对成形的文本,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2.1 教育场域中的学位审查

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场域对其中的参与者会产生结构性的制约作用,参与者在此空间中为获取特殊资源而进行斗争和操控(Wolf, 2011:4)。陈瑞山翻译《沧浪诗话》时所处的是有限生产场域(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而非大规模生产场域(field of large-scale production),也即他翻译时最为重要的诉求是要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只是在小范围内传阅,而并非正式出版或大规模传播流通,他所追寻的并非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而是为了获得难度系数更大的以博士学位为代表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象征资本(symbol capital)。勒菲弗尔(Lefevere, 1998:44)在分析维吉尔(Virgil)《埃涅伊德》(Aeneid)的英语翻译时曾提出,文化资本是翻译的重要原始驱动力,翻译的发起人主要是为了获得文化上的声名。陈瑞山翻译《沧浪诗话》也同样是为了追寻文化地位,即由博士候选人实现“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正式博士。这意味着他的译文要接受比常规翻译更为苛刻严谨的批评,要接受以英语为主要写作语言的指导小组成员的审查以及院系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审查,如果翻译出来的译文过于艰涩甚至措辞生硬、文法不通,无疑

会直接影响读者特别是那些具有论文通过与否决定权的“权威读者”的阅读难度,同时也会在无形当中降低他们的阅读兴趣。这对一个需要参加论文答辩,特别是学术委员会审查的博士论文而言,这种翻译必然是要设法避免的。这意味着陈瑞山在翻译过程中因为面临着相对从属的地位,必须面临巨大的场域风险,即译文如果无法达到学术委员会标准要求的话,他就有可能无法获得博士学位,这种风险迫使他必须比普通译者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提升译文的质量。

为了进一步迎合受众场域(client field)的学术规则,陈瑞山邀请英语世界的本土学者,以他们对母语的特有理解,来阅读他所翻译的《沧浪诗话》,以发现哪些部分可能是英语世界读者所难以理解的,进而加以修改完善。对此,陈瑞山(Chen, 1996: iv)在致谢中特别指出: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卡斯蒂格利尼(Donald Jay Castiglioni),他主动提出要帮我检查我所注释和翻译的《沧浪诗话》能否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理解(comprehensible)。在无数个夜晚,他都与我一起努力,以帮助我阐释清楚那些绝大部分英语世界读者容易混淆(confuse)的很多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和术语。

2.2 抽象阶梯倒置的注解策略

除邀请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对其译文进行润色修改外,陈瑞山在翻译注释过程中,还主动以抽象阶梯(abstraction ladder)的倒置方式,也即化抽象为具体,运用西方读者较为熟悉的个案来对严羽的诗学思想进行例证性解读,以让读者能产生更加清晰明确的理解。例如在“不涉理路”(Not treading on the path of principles or reason)下面的注释中,陈瑞山(Chen, 1996: 91)就作如下解释:“寒山(在西方更为人知的名称是 cold mountain)的诗: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The moss is slippery—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ain; the pines sigh and moan, but they don't rely on the wind. Trans. by Robert G. Hericks, 1990:65.)这首诗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不涉理路’的意思,因为寒山试图打断因果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要观察事物所呈现的状态(to see things as they are),而不是要对之进行逻辑推理。”相对中国其他诗人而言,寒山在英语世界更为人所知。正是由于考虑到了这一点,陈瑞山在此才要去选用寒山诗作为自己的例证,在翻译中也展现了较强的表现力而非仅仅是再现力(张保红等,2025:96)。

受双重意象读者的预期定位驱动,陈瑞山在翻译和注释《沧浪诗话》时,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最大可能的综述和整理,以让读者了解当时所能达到的最新研究水平。这从其在博士论文第349~374页《参考文献》中所列出的详细书目中,就可以看出端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全球化趋势加快,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们有了更多的

机会接触中国大陆本土《沧浪诗话》的研究成果。陈瑞山在《沧浪诗话》的翻译中,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种种便利,通过广泛的多样渠道,对汉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最大可能的搜集整理。根据陈瑞山(Chen, 1996: iv)在论文《致谢》(Acknowledgements)中交代:“我亚洲研究系的同事严秀(音译,原文是:Xiu Yan),在上海逗留期间,也曾为我买过很多的著作。”这就说明,陈瑞山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可能未曾直接来过大陆,大陆的相关研究著作却并未逃出他的关注视野。陈瑞山之所以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如此重视,目的就是力图对这些成果进行集大成式的整合与超越,以让读者能够了解前人成果的同时,也能够知晓最新的研究方向。

2.3 注释文本的信息过载

表面上看,陈瑞山如此详细的“增补改写式”翻译是对原文的注释,但背后还隐藏着更为隐秘的底层逻辑,就是利用注释来凸显自己的才识,证明自己已经达到博士的学术水准。这种知识型或学术型的翻译策略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译者借此来提升学术素养;另一方面也是译者在教育场域中对学术权力的屈从,主动套上规范的桎梏,带着镣铐跳舞。这使得其译文的每一页行文,往往都是注释所占用的篇幅远远要超越翻译正文所占据的空间,从而有可能会产生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ing)甚至是信息冗余(redundancy)。例如在正文的第90页,只有两行正文,其余全是注释,而且这种现象几乎弥漫在陈瑞山的整篇博士论文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注释的详尽性方面,陈瑞山的这部博士论文是要超越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的。因为郭绍虞的《校释》虽然材料翔实,立论公允,但毕竟已是近60年前的旧作,而学界60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却未被有效吸收进来。而陈瑞山的博士论文则不同,在自己卓越的努力以及众多师友的热情帮助下,他对世界范围内的《沧浪诗话》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吸收和整合。就英语资料文献来看,根据第三页第四个注释给出的信息,陈瑞山(Chen, 1996: 3)至少参考过张彭春1922年的节译、宇文所安1992年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翻译的《沧浪诗话》第一章和第三章部分以及林理彰1994年翻译的《沧浪诗话·诗辩》部分。除此之外,根据后面陈瑞山的注释来看,他还至少参考过陈世骧1957年的《中国诗学与禅宗》、叶维廉1970年用英语发表于《淡江评论》上的《严羽与宋人诗论》一文、刘若愚《中国诗艺》《中国文学理论》以及《跨语际批评》等著作中对于《沧浪诗话》的翻译。

3 文化缺省的补偿策略与学术场域的政治逻辑

当英语世界的读者面对一部于800余年前在遥远的中国宋代出现的《沧浪诗话》时,肯定会出现许许多多理解上的困惑。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无法直接阅读汉语原文造成

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法体系和表达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1994年美国学者梅维恒(Mair, 1994: xxviii)在编选《格伦比亚中国古代文学选集》时曾在其《序言》中说:

所有的译者在翻译中国文本时,都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汉语(特别是古汉语)的重要特点是经常省略,为了让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文本,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必须添加一些成分。中国的句子经常缺主语或其他成分,而且不标明性别、数量、时态、语气等等,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英语语法的需要,就必须把这些内容给补充完整。

梅维恒指出的这一现象无疑是每一位翻译中国文本的译者都必须面对的,陈瑞山在翻译《沧浪诗话》时自然也不能逃避。

上述列出的两种原因还主要是在语言层面,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英语世界的读者欠缺理解《沧浪诗话》时所关涉的相关文化知识背景。一般来讲,这种由对原文文化知识背景的欠缺所带来的理解上的难点甚至由此造成的语义空白(semantic blank)现象在译介学领域都被称为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孕育成熟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汉英两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许多重要语词、概念、范畴等,看似可以对应,实则彼此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从这个意义上讲,等值翻译永远是求而难达的美好期许,而文化缺省却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遭遇的现实难题。

3.1 文化负载词的理解鸿沟

具体到《沧浪诗话》的英译而言,如果我们把《沧浪诗话》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入神”直接翻译为“enter or capture the spirit”或是“enter the god or spirit”,相信绝大部分的英语读者在面对这样的译文时,虽然每个单词都能明白,但这个词组究竟要表达怎样的意思,却未必知晓,因为“spirit”或“God”怎么可能被“enter”或“capture”呢?其实,这种表述本身是一种语篇隐喻(textual metaphor)或是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而译者如果只是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直接用拼音翻译为“rushen”,那么应该说,翻译和没有翻译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完全不符合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标准,因为英语世界的读者还是不明白“rushen”究竟是什么意思。通过此个案可以得知,怎样去处理这种语言文化现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对同一性的剥离使得立于间距两端的自我与他者既不能轻易同化对方,也不会任由自我被同化。”(过婧等,2023:75)那么,面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鸿沟,如何去策略性突围进而维持适度的动态平衡,就成为摆在陈瑞山翻译《沧浪诗话》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议题。

勒菲弗尔(Lefevere, 1975:27)曾说:“如果翻译能够在字字对译的基础上达到对等的话,还需要注释吗?”他的这一反问恰恰说明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双方的语言不可能完全对

等,需要通过注释进行增补。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单纯的翻译往往容易造成信息走向真空化,令译文读者难以理解。在这样的情景下,译者就非常有必要对这些西方读者可能欠缺的知识背景在注释中给予增补性解释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补偿(cultural compensation),即采用与源语文本不同的方法在目标文本中产生与源语文本近似的效果,以弥补翻译过程中的缺失。

3.2 作为副文本的译文增补

翻译社会学的重要价值意义之一是可以批判性地反思和探析译者(以及其他参与者和关联者)在译本生成和话语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陈瑞山在翻译《沧浪诗话》时的角色尤为明显,为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协调空间中(mediating zones of uncertainty)为读者引导相对确定的理解方向(Inghilleri, 2005:69),他为文本中的几乎每一处文字,都通过文中脚注的形式介绍了相关的文献来源并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对其中所涉及到的重要关键词或段落,更是尽可能做了补充说明和意义“增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部著作中涉及到的中国古汉字、用典、文学传统、修辞、文化概念、传说、宗教信仰、哲学、政治和社会语境,我都会以注释的形式给予详细补充说明(supplement),以方便现代读者理解这部重要的著作”(Chen, 1996: vii)。

总之,陈瑞山在翻译注释《沧浪诗话》时,由于受汉英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制约,汉英文化信息差别无法通过词汇对应加以弥合,在具体翻译时,目的语中的词汇空缺在所难免。因而,在表达《沧浪诗话》中比较丰富的汉文化信息和内涵时,陈瑞山通过脚注这种补偿策略来提升译文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和可读性(readability),进而形成了翻译的“副文本”(林嘉欣,2022:111),这不仅有效地向西方读者传递了汉语的文化意义,弥补文化缺省所带来的理解上的难度,而且还可以为后来的学者从事《沧浪诗话》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同时,陈瑞山所采用的这种注释法,也可以作为一种翻译范式,为后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英语翻译者参考。

陈瑞山采用注释法翻译《沧浪诗话》中出现的重要概念,固然不是唯一的方法,却是相对有效的方法,因为注释法能为读者介绍足够的背景知识,解释原文中词语的意义,还可以加深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这就使得陈瑞山的注释与他所翻译的《沧浪诗话》的正文彼此可以互相参照,相得益彰,不可分割,形成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有机整体。源语文本的象征资本在目标语场域中经常也会发挥较大作用(Gouanvic, 2010:124)。作为中国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诗话著作,《沧浪诗话》具有特殊的象征资本光晕(aura),而这也是驱动陈瑞山英译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注释法翻译策略,对《沧浪诗话》中所出现的内涵丰富的特色词语,陈瑞山在翻译中尽可能通过注释来弥补英语的词汇空缺,有效地传达了《沧浪

诗话》的文化信息,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英语译文与汉语原文之间的功能对等。这既考虑到了域外读者的文化背景与理解力,又充分表达了汉语的文化意义,其实也是对源语文化中作为经典的《沧浪诗话》的“致敬”和“回响”(resonance)。通过对这种文化空缺的意义增补,可以说,他实现的不仅是奈达等人所苦苦追寻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或“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了,也对《沧浪诗话》原文进行了极大的扩充式增补。可以说,译文所产生的意义空间已经远远大于严羽《沧浪诗话》的汉语原文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瑞山的《沧浪诗话》英译既是对原文的一种翻译“重现”,也是对原文的一种增补式改写;既是对“异质性”的呈现,也是与“他者”的和解(胡陈尧,2022:80)。

3.3 语篇连贯性的受阻

陆志国(2020:54)在对翻译社会学进行回顾性和反思性研究时指出:“大多数翻译学者过于依赖场域分析、外部考证,较少将惯习、场域等概念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研究。”这提醒我们在借鉴翻译社会学研究成果时,既要目光投射到译者所处的外部场域,也要聚焦于译文的文本本身。就陈瑞山《沧浪诗话》英译而言,其译本本身最为显著的特点即为译文对《沧浪诗话》原文进行了全方位的意义增补。对此,我们从其译文的具体形态篇幅也可以略知一斑。该博士论文首先有一篇较长的《导言》(Introduction),共占58页篇幅。作者在《导言》中详细介绍了严羽的生平、《沧浪诗话》的主要内容以及到1996年为止在英语世界的部分翻译研究进展。接下来则是这篇博士论文的重心也即对《沧浪诗话》的翻译解释,在这部分中陈瑞山依据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的章节组织自己的译文结构,共分五章,各章所占篇幅如下:第59~107页翻译第一章《诗辩》(Arguments on Poetry),第108~209页翻译第二章《诗体》(Forms of Poetry),第210~223页翻译第三章《诗法》(Methods of Poetry),第224~282页翻译第四章《诗评》(Commentaries on Poetry),第281~336页翻译讨论第五章《诗证》(Proofs of Poetry)。除去正文前的《致谢》《摘要》外,陈瑞山的全文共计375页,使用的纸张为A4纸,而正文对《沧浪诗话》全文进行翻译的,则是第59~337页,近280页。无疑,以280页的篇幅,去翻译解释不足11000字的《沧浪诗话》,所涉及到的内容应该说是非常全面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通过注释来补偿文化缺省也有可能带来反效果和副作用,那就是读者阅读的连贯性与兴奋性会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当原文中的文化缺省比较密集时,这种缺点就显得更加凸显。例如在陈瑞山博士论文的第101页,全页都是注释;而从111~114页,连续四页都是注释。如此密集的注释,无疑也会损坏普通读者对《沧浪诗话》文本理解的连贯性,无法形成有效的“阅读舒适区”。有学者提出,“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是译者意向性与作者意向性高度重合的结果”(于辉,2020:94)。陈瑞山虽然也有足

够的意向性推动《沧浪诗话》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成为经典,但最终功亏一篑,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4 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源语与目的语的博弈和角逐,更是其背后两种文化话语权的争锋与较量,充斥着或隐或显的权力政治。在陈瑞山《沧浪诗话》英译过程中,翻译的发起与推进、译者的翻译与注释、译本的扩散与传播等共同构成了系统性网络,各方因素维持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动态平衡。在此过程中,教育的审查功能及其背后的学术权力是考察此次翻译的关键维度,对《沧浪诗话》英语首次全译本译文样态的形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导向性作用。陈瑞山译文表面上是翻译,但更多是以产品为导向的研究(product-oriented research),其注释与阐发的篇幅远远超越译文篇幅。陈瑞山自己也坦诚,其翻译与注释主要是“试图对严羽的诗学和世界观(world views)进行多维度理解(multi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Chen, 1996: viii)。如果将其放置到更为宽广的中西文化对话语境来看,陈瑞山以补偿式的翻译策略,将《沧浪诗话》推向英语世界,在异域文化语境中有效彰显了中国文化特色,对深入探讨跳脱语言藩篱,打破中西方信息鸿沟,突围西方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所累计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走出去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昭示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地翻译成外文即可,而必须实现在地化的社会学重构,只有与目标社会文化的融合才能获得“新生”(afterlife),才能够在彰显民族性特色的同时获得更多世界性的传播。

参考文献:

- 曹顺庆. 2020. 变异学与他国化:走出东方文论“失语症”的思考[J]. 文艺争鸣(6): 76-82.
- 陈瑞山. 1992. 沧浪诗话的历史范例[J]. 中外文学(11): 67-81.
- 过婧, 刘云虹. 2023. 间距与中国文学外译中的有效对话——以莫言小说在法国的译介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4): 69-76.
- 胡陈尧. 2022. 论贝尔曼翻译伦理思想的哲学蕴含[J]. 外国语(1): 79-85.
- 姜锋. 2021. 建党百年与中国外语教育新使命[J]. 中国外语(4): 1-7.
- 李沐子. 2023. 从文本旅行到文化杂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读者的译介路径探索[J]. 外国语文(3): 117-122.
- 林嘉欣. 2022. 副文本与形象重构:华兹生《庄子》英译的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 外国语(2): 111-120.
- 林克勤. 2026. 体认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J]. 外国语文(1): 156-167.
- 陆志国. 2023.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 51-58, 84.
- 王亚, 文军. 2023. 国内译者研究 30 年:现状与展望[J]. 外国语文(4): 121-130.
- 于辉. 2020. 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译者意向性研究——以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2): 94-103.
- 张保红, 蔡小莹. 2025.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表现力研究[J]. 外国语文(5): 94-104.

- Bourdieu, P. 2005. Habitus [G] // J. Hillier & E. Rooksby. *Habitus: A Sense of Pl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3-49.
- Chen, R. S. 1996.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Yan Yu's Canglang Shihua: an Early 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Poetry Manual*. [D]. Ph. 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Eoyang, E. 1993.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 Gouanvic, J-M. 2010. Outlin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Informed by the Ideas of Pierre Bourdieu [J]. Schultz Laura (trans.). *MonTi; Monografía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Vol. 2: 119-129.
- Hermans, T. 2004.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Inghilleri, M. 2005. Mediating Zones of Uncertainty: Interpreter Agency, the Interpreting Habitus and Political Asylum Adjudication [J]. *The Translator* (1): 69-85.
- Lasswell, H. 1949.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G] // Lyman Bryso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84-99.
- Lefevere A. 1975. *Translating Poetry: 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 [M]. Amsterdam: Van Gorcum, Assen.
- Lefevere, A. 1998.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 [C] // S. Bassnett &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41-56.
- Mair, V. 1994.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ida, 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 E. J. Brill.
- Nord, C. 2001.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Wolf, M. 2011. Mapping the Fiel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 207: 1-28.

From Discourse Embedding to Communication Breakthrough: A Study of the First Ful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nglang Shihua*

ZHONG Houtao

Abstract: In 1996, Ruey-shan Sandy Chen translated the full text of *Canglang Shihua* into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 first and onl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nglang Shihua* in the Anglo-American academic circle. Chen Ruishan's translation is neither descriptive nor empirical translation, but actively breaks through, with the help of paraphrasing and resisting strategies,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discourse. The translator also highlights the culturally loaded vocabulary tha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refines and displays the spiritual signs and cultural essenc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ffectively embeds into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system with conciliatory rather than dominant discourse, forming an innovative text.

Key words: *Canglang Shihua*; full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陈宁